

欧洲文化系列丛书

朱孝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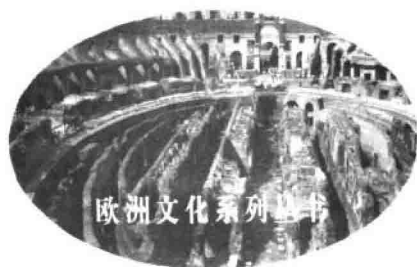
OUZHOU NIEPAN

学林出版社

欧洲涅槃

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

本书是国家社科“九五”重点项目之一



欧洲涅槃

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

朱孝远 著

世界
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涅槃:过度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朱孝远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2
(欧洲文化系列丛书/朱孝远,曹维劲主编)
ISBN 7-80668-381-X
I.欧... II.朱... III.社会发展史-研究-欧洲-
近代 IV.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977 号

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



作 者——朱孝远
责任编辑——乐惟清
特约编辑——严耀中
封面设计——贺 强
责任监制——叶 刚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6.625
字 数——33.2 万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381-X/G·142
定 价——28.00 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本书的思想

第一篇 过渡期的提法 1

- 第一章 过渡期的原理 9
- 第二章 西方封建主义的报复 26
- 第三章 作为政治理念的文艺复兴 87

第二篇 早期革命的任务 171

- 第四章 寻找真正的国家 175
- 第五章 精神王国与世俗王国 231
- 第六章 自下而上的风暴云结 279
- 第七章 理性历史的开始 344

第三篇 大革命的性质	415
第八章 人民的自我肯定.....	417
第九章 英格兰岛的风暴.....	443
第十章 本书的结论.....	467

第一篇：过渡期的提法

每当我们分析社会形态的转型，我们重视引起这些变化的主客观条件。凡具备形态转型条件的地区，皆因其所依据的基础有所不同而分别形成了不同的过渡方式和过渡内容。欧洲各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化，应该就其本身的状况来追究它的途径。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最显著的特殊性，在于它有一个长达四百五十年的过渡期。惟有认识此种特殊状况的存在，我们才能回答为何欧洲最早进入近代社会的问题。

作为一种优先考虑，本篇提出过渡期的理论并且具体探讨社会秩序失去规范如何成为过渡期形成的原因。黑死病以后的欧洲深陷在秩序紊乱的危机之中，但也因此让欧洲获得了一种可能性：要么维持旧貌让自己继续败坏下去，要么为了生存让自己在比较有希望的可能性中成长。生存危机让欧洲选择了后者，因此先进分子被召唤起来探索新路。欧洲的转型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发生？这取决于人们认识现状的能力以及让自己的行为符合外在实情的程度。当欧洲沉痛而模糊的结构危机被充分认识以后，转变机制就成了它的唯一选择。这就是说，转型的真理在最关键的时刻从最原始的现象之中显露了出来，凡是与真理和实在符合一致的东西被肯定为重建秩序的出发点。

然而，失范和危机作为一种基础是否也能让欧洲再生呢？这涉及到改革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封建主义结构危机以及人的因素如何能在特定的环境中变成了主体。我们应该搞清楚，危机作为一种背景提供了重重可能：一是让市民阶层的代表人文主义者胜出，他们在人类生存的平面上适时提出了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振兴欧洲的纲领。同时，它也证明了欧洲过渡的长期性和艰难性。“危机导致转型”的说法无疑是一种浅表的、形式化的解释。因为条件“空空如也”，必须重建结构，恢复生产，才能把“认识了真理”转变成为“现实的真理”。这就是说：欧洲向近代的过渡必须要有一个酝酿期，它既是一种革命的起点，同时又是一段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人致力于创造条件，以便让事物真正按照真理的召唤去进行。

这一时期也是革命的酝酿期。假如说欧洲通过过渡期完成了向近代社会的转变，那么，过渡期的原理就成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分析基础。过渡期的历史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光明和黑暗的对峙，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峙产生了一个新生儿——近代的欧洲。在这里，理性是生动地、持续地成长的，它带来了一个新的方向，从而结束混乱、开辟通向近代社会的道路。在过渡期这个茫茫航程中，开始时几乎没有一件东西是固定的、稳固的。不久，理性因为直接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相交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结构，一个时代诞生了。要知道，近代欧洲的各种元素都是随着这个“过渡期”发展而来的，我们要注意的，因此首先也就是此过渡期的特征、形成原因及其重要影响。

在这个阶段中，重要的一个现象是知识分子转向了为社

会服务。至少，伟大的诗人但丁就是在考虑政治和科学问题。^①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大大改变了，包括僧侣在内的学者、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法律家、学生、建筑师、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不再只是自己专业的主人，他们成为领导社会“再生”的先锋。知识的功能社会化了，知识成为力量，目的是同彼岸之学告别，用一种切合实际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自救。^②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制订出“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秩序不要紊乱，要丰裕不要饥荒，要文化不要愚昧，要美德不要腐败”的纲领，这个纲领成为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理论指导。这样的纲领反映出人类战胜危机的要求，很快被传播到各地，由此成为欧洲再生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完全有必要重新追问文艺复兴的政治含义。

必须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出现的市民阶级与君主结盟——建立驯服危机的统一战线的做法决不是缺乏革命性的表现。在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时，尤其是在过渡期的第一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无法加以简单定性的结构，从而造成了难以判断其为封建主义或近代资本主义的性质评判困难。比如，新君主制的出现，不仅是市民欢迎的制度，也是众多贵族愿意加以辅助和服务的制度，我们却不因为它的这种模糊性而否定它的基本方向。又如：我们常常因为某些人文主义者带有宗教性、温和性，或与君主和教皇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就断言他们为有局限的、次一等的人文主义者。其实，根据我们的新的理论框架，这些人文主义者的行动，不仅不是缺陷，反而恰恰是他们理性和科学的表现——正是这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才使市民阶级最终赢得了对于封建主义的胜利。^③1500年时，欧洲的市民阶级业已通过在这之前的大约一百五

十年的奋斗,完成了驯服危机的使命,并且在一些国家里建立了振兴欧洲的统一战线,提出了振兴欧洲的理论纲领,并且建立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持公共秩序的新君主制政府。如果欧洲还要向前发展的话,那么,这些成就足以导致了早期市民革命的爆发。

① 但丁写了一本《对与错的问题》的书,讨论科学问题,但它甚至比他论政治或道德的书更稀奇。例如:问题:是否水,或水面高过地,或地面?分正方和反方,正方辩论为五条理由,一是几何学的证据,认为地与水各有其范围和中心;地的中心也是宇宙的中心,因此水高于地面。理由是伦理学的证据:水是一种比土更高贵的元素,因此在宇宙的组织中,它应该得到一个更卓越,更高级的位置。理由是实验上的证据:水手航行时,看到陆地消失在海平面之下。理由是经济学的证据:水的供应处,即之,海一定比地高,否则,当水向下流时,就不能造成泉、湖等。理由是天文学的证据,因为海水随月亮之移动而涨落,它的领域必定是椭圆的,如同月亮椭圆形的轨道;因此海水的领域比地的领域高。反辩的一方:尚未找出理由。一由观察来反驳,水由陆地流向海洋,所以海不会比陆地高。二、由推理来反驳:水不能高于干地。争鸣:水只能比陆地高。因为第一,假定水是离心的,或第二,假定水是向心的,但有某些杂质。但是因为甲:水往低处流,并且乙,水是流动的物体。所以(1)不能成立,否则会有三种情况发生:第一种:水能同时向上或向下流。第二种,水和土会向不同的方向移动。第三种,水和土两体间的重力问题就混淆不清了。(2)的不能成立是因为甲:含有杂质的水就会散开,因此杂质不会存在;乙:这种解释是不必要的,凡是不必要的都违背了上帝的意志与自然。(参见布林顿、克里斯多夫、吴尔夫编著,《西洋文化史》第三卷中古下,台湾学生书局民国1979年版,第216—218页。

② 文艺复兴时期新思潮的种类问题,极其复杂。在艺术上,有威尼斯学派和佛罗伦萨学派,在思想领域,有意大利人文主义、北部人文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市民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者撰写的著作的内容来看,有批判现实派、乌托邦理想主义派、劝世派、模仿基督派、古典文学研究派、政治复兴派等。人文主义运动发源于意大利各邦,迅速流行到整个欧洲,盛行时间长达13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三百年之久。

对现实的批判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特色,代表人物有伊拉斯姆、

托马斯·莫尔、拉伯雷、薄伽丘等。政治复兴派的代表人物有但丁和马基雅维里，虽然他们的思想很不相同。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有伊拉斯姆、托马斯·莫尔等。古代文学研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劝世派的特征是教导人们怎样当君主、当丈夫、当朝臣、当妻子、当医生、当仆人。乌托邦理想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莫尔。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菲奇诺和匹果。

文艺复兴的精神和原则无法量化，但首先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人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从五种文化源泉中得来的：有文学背景，起源于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但这是次要的。还有一个来源是《圣经》。还有是贵族文化和宫廷文化，譬如《朝臣论》谈的完全是宫廷的事情。最后，是市民文化，这种种不同的来源，虽然表现地有强有弱，我们都认为构成文艺复兴的来源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

再生的一个含义，就是知识分子行动起来参与社会的改革。我们刚才所叙述过的这段历史时期，从国家形态、经济、制度和行政上来说，显然就是欧洲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的一个时期。这种危机状况，促使了知识分子对自己力量和才能进行最深刻的反思。从这个角度看，这又是知识分子的创造力首次得到充分表现和充分发展的时期。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变化是学术风气和知识分子大大改变了，这是由于：危机把大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充分调动起来并直接进入到政治的各个领域中。当时的知识分子结构自然包括着僧侣、学者、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政府秘书、学生、音乐家、历史学家、建筑家、科学家、医生、算术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们不再是自己领域的主人，而成为救灾救亡的先锋。专业的樊篱被打破了，知识分子开始通盘合作。虽然在同一时期，知识分子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职业，但思考的范围是大大宽广了，这种合力，就为许多新的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术风气中产生出许多种明显的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知识功能的社会化。在每一个领域，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跨领域的明显的目标：如何运用知识来克服社会危机。在个人主义的旗帜下，一种同以往完全不同的心态出现了：就是认识到中古的学问不能解决现实的生存问题，必须同以往的彼岸学术告别，用一种切合实际需要的新学问来实现生存的再生。这种同以往学术的决裂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革命，表现在人们用新的思想来考虑现实的问题。

这首先表现在从彼岸玄思的传统学问向经世致用的先进学问的转变。知识初开的近代心灵，全部的任务就是运用朴素的知识再造欧洲美丽的风光。人们不再纠缠在中世纪、古代、基督教、异端这些名称上，而要从“各种”

已有的学问中,来找出能够用来克服危机的知识。这一切的含义就是说:不论是何种学问,只要对现实有用,就应当发扬。文化的本身不再被标签割裂,因为危机使得这种割裂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文艺复兴就是一种思想的大解放运动,因为不再是某种观念来界定什么是学问,而是反了过来,实践成为检验学问是否有用的尺标。这种尺标很可能是经验性的,只要对现实有帮助,就可以通行并发扬光大。对于危机下的欧洲而言,这种作法就是一笔勾销各种中古意识的束缚,而用“靠得住”的知识来改革欧洲。这种学问还可以是来自异教徒的,因为正是来自拜占庭的古典神学、甚至是来自阿拉伯的科学,只要是对欧洲有利,欧洲就不再对它们拒绝。这样,危机下求生存的本能就否定了宗教巨大的锁链的合理性,用布克哈特的话,就是:他们是一群最复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今天具有这样一副面貌,明天又换了另外一副面貌;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因素,这也是为他们的时代所完全承认的。(参见吴于廑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下册,第396页。》)领域无限止的扩大了:文学、政治、艺术、宗教、古典、土语作品蜂拥而至。逻辑的语言,曾经是这些刚刚从中世纪神学中露出脑袋的学者们拿手的学问,现在被活生生的修辞语调取代了。在文学作品中,基本术语是美德、命运、能力、教育、力量、再生,尽管这些语言在表达方面显得相当生硬和不尽优美。然而,随着文学艺术的进步,新的知识分子(他们自称为人文主义者)把各种学术混合起来,加在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不成熟的体系之中——他们竭力在寻找一种并非抽象的新的沟通的方法。在这种图式中,经验和生活成为表达的直接手段,人的美丽和人智慧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具体的风格。人们长期以来依赖逻辑的方式纠结学问的做法被抛弃了,大众文化成为主流,并且迅速地取代了用于祈祷的神秘宗教性文化。被长期禁欲的耶稣现在有了庄严的目光,而圣母玛利亚现在成为具有端庄和恬静笑容的少女模样。人和神之间的距离销蚀了,人间和天国的距离拉近了。一个新的主题:人和身具有相同的美丽的性格——被反复体现在文学、建筑、雕刻、教堂壁画、甚至宗教歌曲中,现实在艺术中成为美好又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其中每一个人都能够用美德来建造非常舒服的生活。艺术家和学问家就这样“回到生活中来了”,他们现在非常用心地表现普通人的乐趣。如果我们注意到这种美丽的艺术境地同恐怖的先生生活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反差的话,我们就要佩服艺术家们过度的脑力活动和他们想把人类引入仙境的高深用意。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却是有意义的。因为“为了使真理困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来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诗人呢?能不能说诗人是疯

子,正像他们的毫无见识的敌人们,胡说八道所说的那样呢?”(薄伽丘语)

- ③ 我准备探讨的问题是:欧洲在向近代社会过渡时具有什么特殊性,以及在整个过渡时期,欧洲具有什么样的发展概念或行之有效的途径。我注意到,世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即便在欧洲究竟是何时进入近代社会的分期问题上,就存在着大相径庭的看法。有一派人认为欧洲进入近代社会很早,早在十四五世纪,部分欧洲国家已经进入了近代社会,而新思想,新宗教,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地理观念在各地发展蔓延,进一步引发了新旧制度之间的剧烈冲突——通过革命,至迟是在十六七世纪,欧洲主要国家进入了近代社会。另一派人与上述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倾向于把欧洲进入近代社会的年代定在19世纪早期。

面对纷纭争竞的观点,于是就有了“过渡时期”这个说法——大致是把从14世纪至18世纪这四五百年,说成欧洲迈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虽说这种观念比较持中或持平,但只要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这一概念所带来的问题比起它试图解决的还要大得多。首先,赞成欧洲较早进入近代社会的学者毫不让步地把十五六世纪称为“近代早期”,他们认为即便是有一些中世纪的色彩,过渡时期看来也已近代的了。其次,更具歧义的是在,具体运用时“过渡时期”这个概念时,很显然地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人们将发现这一概念将影响人们对一些社会存在进行准确定性。例如:在论及欧洲近代社会萌芽时,学者们对新君主、风雅的绅士、饱学的人文主义者、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以及他们的优美、恰当、理性、灵活、生动都是交口称赞的,他们被誉为“资产阶级化了的君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革命的斗士”;然而,一到论及“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时,同样的批评家的言辞却突然之间严厉起来,上述的君主和贵族被贬成为封建阶级和中世纪的代表,因而成为革命的对象,而那些僧侣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又因为他们的矛盾性、宗教性、与教皇、君主们复杂的私交以及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虚夸、造作、平庸和浮艳,被认为“后半身是反动的”、“有封建性质的”,因而要加以批判或谴责。结果,人们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地来界定“过渡时期”的人事,无意中却把本来很清楚的事物,搞成极不明确和不敢肯定的了。

上述的分期歧异和对过渡期事物性质评判上的困难,说明我们对过渡期和过渡时期发展概念在认识上尚有一定程度的欠缺。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怀疑“过渡时期”的观念究竟是否可以由一种“合理推理的想象力”来提出。我以为,“过渡时期”如果作为一个明确的历史概念,就只能是指一种实际存在过的、可以由经验来加以证明的历史存在,而决非为一种理智的产物。因此,它甚至和意志无关。其次,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得出比较圆满的结论,很可以考察一下什么是过渡和过渡时期的发展原理,因为好些

使用这个字眼的人看起来并不很明白这个名词的意义,而且对于这件事情本身也缺乏明确的概念。过渡是指一事物向另一事物逐渐转化的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任何一种非此即彼的界定(如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的、近代的),显然都是与这个名词的原意不相吻合的。过渡如果作为一个特定的时期来看待的话,那么,它应当是一个包含着许多种可能性的空间,尽管这些可能性表现出了一定的方向和趋势。在本文中,我打算弄明白:是什么原因使得欧洲存在一个长达几百年的过渡期;如果过渡期的存在是欧洲社会转型的要素的话,那么,它又表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是否产生出特别适合欧洲过渡的发展模式或后果;或者,让我们归根结底地说,是否正因为欧洲在过渡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特点,使它能够较早或较顺利地进入到近代社会。

第一章 过渡期的原理

世上只有旧结构自我崩溃但新结构尚未成熟时才会出现过渡期；而且，当制度空白带来普遍的社会紊乱时，人们就看到了建立新秩序的必要和政治革命的曙光。

1348年，一场惊心动魄的黑死病，把一个潜伏已久的大危机给挑明了。^①国王、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都有跌入死亡之感，倘若社会再不进行调整，人们相信，他们将必死无疑。危机在特定时期变成了主体，意指“无法恢复的困难”。它是根基性的东西，一切瘟疫、战争、饥饿、贫穷、政治紊乱和道德沦丧，只不过是生长于其上的枝叶。这样，危机与“修理”、“医治”就无必然联系，中古的封建体制已经患上了绝症，除非是出现一个新生儿，否则的话，对原来的病体进行修补，已经显得无补于事。结论是：危机非困境，也与伤口的愈合无关。^②

此外，助成黑死病得以在欧洲大肆肆虐的那种社会联系，就是制度的亏缺。而且，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相反的情形，即完善的制度可以限制自然灾害的蔓延和弥补灾害的损失时，上一段谈的这一论点的倾向性就变得十分明显了。假如把黑死病看作只是一颗外来的灾变种子的话，那么，它至多就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偶然的东西。但是在制度亏缺的情形下，它不

得不成为一个在腐烂之所进行充分表演的主角,同时,它也就成为一名崩溃秩序的清道夫,而且是以一种特殊的鸩毒彻底吞噬欧洲秩序的那种清道夫。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并非所有的瘟疫都能够造成如此之大的危害的。然而当时欧洲制度崩溃、社会紊乱的局面,开放了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让瘟疫流行,使它能够对欧洲的人口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密切关注的并不是黑死病这场灾变本身,而是为这场灾变提供肆意流行基础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黑死病才成为分析欧洲社会秩序崩溃的一个标志,至少它本身也成为我们进行思索的对象。

黑死病过后,欧洲出现了一个长达四百五十年的过渡期。这段历史,因其具有鲜明的转折和变化的特征,在世界历史中别具一格。过渡期首先是指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社会在这里不是简单地分为旧和新,而是旧的形态逐渐地变成废墟,废墟又孕育出各种灾难如战争、饥饿、穷困、愚昧和秩序紊乱,这些紊乱又变成了催促新兴因素急迫产生的原因。在这里,历史一步一步地打破旧形态的脸面,逼迫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我们看到黑死病以后的欧洲设法把自己从崩溃的紊乱形式中解放出来,可是这个努力又不能够很快地比那个业已崩溃的秩序更优越。所以,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就这样被昭示了。

我们不妨把有过渡期的转型当作欧洲文明发展的一种特色来加以理解。在社会形态的转型之中,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有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过渡期,另一种是没有或只有很短的过渡期。在社会形态的转型方式中,也有两种:一种有过渡期的,称为渐变;另一种没有,或者只有很短的过渡期,称之为突变。所以,出现过渡期原因是:原来的旧的生产关系已经

走到了尽头,而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仅处于萌芽状态。如果旧的社会形态发展得很充分,同时,新的生产关系也在旧的形态中成熟,就会出现新旧之间的剧烈斗争,这种冲突型的转型方式,在没有明显过渡期的转型中表现得很充分。

在有过渡期的转型中,旧有的形态因为本身的不完善性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新的社会形态尚未真正形成,或者仅处于形成阶段。有过渡期的转型在欧洲出现了不止一次,如罗马帝国崩溃时,封建关系仅处于萌芽状态,结果就出现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过渡期。同样,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也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出现过渡期,时间大致是从 1350 年至 1800 年的四百五十年。这两个欧洲历史上的过渡期的出现,表明我们对于欧洲的社会形态转型的研究,尚需做出一些新的思考。

在没有过渡期、或者只有很短暂的过渡期的社会转型,往往是发生在旧的社会形态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地区。在这里,对旧有体制的任何破坏都会遭到旧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抵抗。同时,又因为旧有的社会形态发展得比较充分,它的机制比较完善,要对它进行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结果,在旧有的社会制度下,产生出强有力的新兴力量或社会集团,从而使转型表现为新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得很充分、很制度化,由于封建制度过于完善,结果使得向近代的过渡只能通过像辛亥革命这样的斗争来加以完成。这样的转型,往往没有明显的过渡期,也没有过渡时期中革命派与守旧派之间为驯服危机而结成的统一战线。

尽管两种方式都是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两者却各自有着

向近代社会过渡的不同基础。社会转型的根本目的是要把社会引向光明的前景,即抛弃过时的体制和建立有希望的体制。对这种过渡产生快感和痛感的强烈印象的绝大多数观念也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属于对过渡产生快感的情感来自有过渡期的转型,那里旧有的封建制度已经全面瓦解,因为经受了过多的苦难和危险,社会上大多数的人们对抛弃已经死亡了的封建主义并无太多的惋惜,但对建立新的有希望的制度却抱欢迎态度。另一种情况是,旧有封建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善和充分,从而产生了一个思想顽固、竭力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封建贵族集团。这使得过渡需要用非常激烈的手段来加以完成。没有明显的过渡期的转型即属于这种类型。

这样,在这里探讨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就不失为一个恰当的时刻和明智之举了。我们的看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认为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并非是历史错了,而是我们实际上是在并无二致地在运用“中世纪”或“近代”标尺在衡量四百五十年过渡期中发生变化的事物。这样,问题就出来了:用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这样的词汇来为发展变化中的事物定性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过渡时期的发展概念?要回答这些追问,我以为,在当前是非常迫切的。

例如:在论及过渡期的性质方面,一些学者视其为“资本主义”或“近代社会的开端”。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它仍然属于“封建主义旧结构”,认为尽管腐败之树上已无多少绿叶,底部也无多少养料,旧结构却仍在几无秩序的情况之下气急败坏地汲取社会的养分。这样,何谓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紧迫、必须弄清的问题。

然而,有许多新的证据都在挑战传统的过渡理论。弗兰